

让世界读懂中国 让中国了解世界

21世纪国际评论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0年第一辑（总第一辑） | 2010 Volume 1 No.1

孙 哲 | 美国有多“美”？

刘亚伟 | “中国特殊论”意味着什么？

梁自存 | 中国工人之身体政治

展 江 | 大众传播法与中国民主政治

丛日云 | 民主是否等于平民政治

丁源远 | 布鲁金斯学会：思想的力量

21世纪国际评论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0年 第一辑（总第一辑）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世纪国际评论. 第1辑 / 刘亚伟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604-2758-4

I. ① 2… II. ① 刘… III. ① 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1111号

《21世纪国际评论》

主 编: 刘亚伟

责任编辑: 陈 芳 任 洁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590

网 址: <http://press.nw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 × 1094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2758-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寄语

几千年来，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一向是典型的“中央帝国”。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自持自重，构成了一条自我发展的主线；天灾中的自力自救，人祸时的自相残杀，亦可谓一套自我循环的模式。直到1840年，远方来客敲开了帝国的大门，远方的思想、技术和理念也随之蜂拥而来，从而打破了帝国的封闭状态，改变了帝国的发展轨道，让一个几千年来与其他文明平行发展的文明系统无以为继。马戛尔尼不会想到他本人拒绝向乾隆帝磕头会最终引发两国间的一场战事；威尔逊不会想到他与日本在巴黎的交易居然粉碎了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崇拜；马克思更不会想到他的几部著作会在中国引发如此波澜壮阔的风潮和巨变；而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导师列宁也不会想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土崩瓦解和有着七千六百万党员的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屹立不倒。

如果说陡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人，曾经以其不竭之智慧汲取来自海外的文明和理念，以其血肉之躯抵御可能导致亡国亡种的外来武力，那么30年前邓公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使国人再次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为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又一次创造了历史机遇。

我们回顾历史，放眼当下，不是出于搜孤猎奇的兴致，也不是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要认真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展望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因为今日之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而今天的世界，亦是容纳了中国的世界。明日之中国，将如何进一步融入人类文明的共同进程？未来的世界，又将为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特此，我们记录下海外的人、事和思，关注他们如何改变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考察他们在今天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而反思一个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疾步奔跑的中国需要面对的种种客观现实。

谁才是中国历史与当下中国当之无愧的主人翁？正是在这片辽阔而富饶、多事而多灾的土地上为了生计而忍气吞声，为了主义而前赴后继，为了血脉延伸而揭竿而起，为了国家富强而走南闯北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们关注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关注他们在现代化的车轮下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苦痛，因为只有记录下他们默默无闻的故事才能还原中国更加喧嚣的历史，描述他们如歌如泣的诉求才能掌握中国更为根本的诉求，才能帮助我们跨越这个国家走向复兴的路途中会遭遇的屏障与壁垒。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之后的剧烈变化，各国转型与发展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使孤立的国别史不再可能是最合适的参照。只有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当代各国面临的种种问题，才可能具备现代公民的常识和判断，才能在中国当代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因迷失自我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善良的执守，才能真正快乐地享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在此，我们希望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和真实客观的文字，创造并实践一种大众学术文体，为读者展现各国的发展历程，并以此来透视与世界互动中的中国。无论您是心系天下还是恪守底线，无论您身居哪个社会阶层，无论您是集体主义的一代还是崇尚多元价值观的80、90后，我们都希望这些文字能够为您带来阅读的快乐和有益的启迪，伴随您体验一名现代公民平凡中的尊严、自由与快乐。

21世纪 国际评论

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

编委会成员（按字母排序）：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

胡 伟（上海交通大学）

刘亚伟（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

乔 木（北京外国语大学）

孙 哲（清华大学）

张小劲（清华大学）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执行总编：

刘亚伟

执行副总编：

Justine Zheng Ren

本辑编辑：

刘亚伟，Justine Zheng Ren

Editorial Board:

Riyun Co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ei H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Yawei Liu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Mu Qiao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Zhe Sun (Tsinghua University)

Xiaojin Zhang (Tsinghua University)

Shukai Zhao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Editor-in-Chief:

Yawei Liu

Deputy Editor-in-Chief:

Justine Zheng Ren

Executive Editors for this Issue:

Yawei Liu, Justine Zheng Ren

目 录

2010年第一辑 (总第一辑)

编辑寄语

1 国际瞭望

2 中美对话

- 3 孙 哲 美国有多“美”?——中国的美国学现状点评
- 11 刘亚伟 “中国特殊论”意味着什么?——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
- 16 王 梅 一“失”足成“千古恨”:解析奥巴马医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21 徐 贲 当精英主义遭遇公民意识: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

27 世界风云

- 27 赵可金 霸权的困惑:奥巴马阿富汗战略调整的政治动因
- 34 Roberto Foa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 38 王艺华 头巾、推客与学生:伊朗的1979与2009
- 45 谢喆平 新面孔,新想法:对中国四次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高层竞选的解读

51 中国观察

52 世界工厂里的中国劳工

- 53 梁自存 中国工人之身体政治:飞速增长的经济与迅速垮掉的身体
- 57 郭于华 专家评论: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 59 余晓敏 中国工人之产业公民权:“民工劳动体制”的改革
- 64 郭宇宽 中国工人之第二代移民:2009京沪两地新移民第二代成长调查

73 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

- 74 展 江 大众传播法与中国民主政治
- 78 魏永征 国际惯例与中国微型“新闻记者法”解读
- 82 吴 麟 宽容与法治: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基础

目 录

87 学贯中西

88 民主研究述评

- 88 丛日云 民主是否等于平民政治
- 92 宋思涛 越民主越好么？——西方学者对大众民主的反思
- 96 佟德志 给民主打分：西方民主指数的研究及其意义

101 他山之石

- 101 郝 娜 “内卷化”理论在中国
- 108 Justine Zheng Ren 庇护主义与地方威权统治

113 海外中国研究

- 113 王新松 从选举到治理：中国基层政治的海外研究

117 海外智库

- 117 丁源远 布鲁金斯学会：思想的力量

121 读书沙龙

- 121 王飞凌 中国的崛起及其解读
- 125 王 鑫 林茨论民主转型与巩固

127 英文目录

129 英文摘要

因为国情和主义，“让中国了解世界”并不容易，即使在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我们希望通过准确的描述、理性的分析和冷静的判断介绍海外大大小小的事件或上上下下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中国的人和事，或者是中国可以引以为鉴的转型、失败和胜利的经验。

编者按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 (Michael H. Hunt) 写过一本书, 题为《特殊关系的建立: 至1914年的中美关系》。他认为, 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在美国是传教士和商人, 出于保护财产、生命及自由迁徙的需要, 他们引领美国政府步入这个神秘而喧嚣的国度。

自1914年起, 中美关系经历了更多的混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 威尔逊总统将胶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引发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美、反西方浪潮, 并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然而,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支持, 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失利, 以及此后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阻隔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长达30年之久。当毛泽东立誓要联合美国工人阶级与非裔美国人一起埋葬华尔街掌权的美国“华尔街政府”时, 美国总统约翰逊则在考虑是不是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中国这边支起了高高的竹幕, 美国那边则想方设法遏制中国。

直到1979年12月卡特总统顶住国会和援华院外集团的强烈反对, 毅然决定与中国建交之时,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和。同月, 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开放。

到了2010年,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环环相扣, 不可分离。两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越走越近, 意识形态渐行渐远; 民间交流日新月异, 政府交往疑心重重。“中美对话”不仅仅是重要的, 而且是必需的。

美国学者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的博士论文《美丽的帝国主义: 中国看美国, 1972—1990》详细描述了改革开放初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者如何分析、总结和归纳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过去和现在, 是第一个为中国的美国学研究“作传”的美国学者。孙哲教授的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的美国学研究的“后传”。孙哲教授并不满足于为中国的美国学学者“作传”, 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中国的美国学研究目前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

“和平崛起”“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出现频率极高, 这样的自我定义让普通人感到自豪, 让精英倍感陶醉。其实, 这样的自我“标榜”在上个世纪初的美国也出现过。美国政治学著名学者路易斯·哈茨 (Louis Hartz) 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里, 将美国的与众不同定义为“美国特殊论”。中国现在有了自己的“特殊论”, 美国人怎么看? 刘亚伟的文章试图回答这个有趣的问题。

中国的医改雷厉风行, 美国的医改步履维艰; 中国医改的启动靠几个报告、一个文件和一次讲话, 美国最新的医改始于奥巴马的竞选承诺, 终于国会的立法。奥巴马没有自食其言, 国会在一年内拿出一个只有民主党支持的方案。孰料, 麻省联邦参议院补选民主党翻车,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州共和党参议员一举获胜, 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失去了超级多数, 无法抵御共和党让医改方案“流产”的攻势。一个州的选举颠覆了一个党一年的努力,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模式。王梅的文章讲美国医改的故事, 虽然没有刀光剑影, 却是招招扣人心弦。

美国“特殊”, 因为特殊才发达, 因为发达才强大, 因为强大才主宰世界。那么, 美国的特殊从何而来? 美国是怎样培养能够保持自己特殊地位的人才的呢? 徐贲教授在美国教书, 对此有不少见解和经历。美国的科技不可谓不强, 但是让她的科技一路领先的恰恰是她的人文教育。中国从英国的炮舰驶来就开始了“赛先生”重要还是“德先生”重要的辩论, 至今未果; 现如今又开始了寻找“科学”和“发展”的节点, 却始终忘了一点: 人文教育是一切科学和发展的基石。



美国有多“美”？

——中国的美国学现状点评

孙 哲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美国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来源于如何站在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视角上来深化美国学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具有独特的国情，其最关键的发展特色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而领导方式也大不相同。美国在制定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时不需要过多考虑它本身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的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已经非常明确。但是，中国建国近60年来社会结构和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在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一直强调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及文化多方面的综合性稳定。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在政治与外交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面临着三大挑战。

挑战之一，是对美式民主理念如何解读、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美国内政上的民主实践并积极加以借鉴问题。

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民主有过一段深刻的评论：民主要么可以被比喻成有形的摩天大楼，要么可以被看成是变化多端的天气；前者易于识别，后者却难以判断。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有多相信民主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1]如果民主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形式，那么区分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就变得显而易见。反之，如果民主能以多种模式出现，作此区分便会有许多困难了。美国人一直相信自己是“世上唯一一

个建立在信条上的国家”^[2]，而从历史上看，有信仰的民族必定能够战胜一切强权。美国概念上的民主大多是指对有政治决策权的职位实施公开竞选、全民投票，并且，作为自由党派能有效参选的前提，保证公民宪法权力如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3]西方民主的关键所在即多数人掌权、权力分化，在这种制度下，责任和义务的修建完善很大程度上就要通过定期的激烈竞选来对统治阶层进行适当的约束。^[4]中国意义上的民主与此有显著差别。事实上，当民主概念最初进入中国时，它仅仅被视作“为统治者的摩登和富有锦上添花”^[5]。长期以来，我们承认民主的实际的效益，但却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民主。即使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事实上它却往往被定义成为政府出面来为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而非政府开放并被大众直接影响。在这一中国化民主的概念背后所未提及的根本前提是对自由、个人主义的限制和对集体主义的坚持。

美国式的民主到底魅力何在？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对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无法回避。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及西方社会都认同民主具有以下功能性优势：它可以调节冲突，可以赋予政权以合法性，可以提高政府质量，同时也能促进社会和

[1] Charles Tilly.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roceeding of a Workshop*. Commission on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1: 25.

[2] The founding fathers believed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power of sword will always be conquered by the power of spirit.” Gilbert K. Chesterton. *What I Saw in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1922: 8.

[3] This definition follows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third e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2.

[4] Mayer, Lawrence C. *Redef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Promises versus Performance*.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9: 45.

[5]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谐。¹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惯例的实践，却常常误导我们重视作为解决问题办法的民主而忽视作为建构更有竞争力和效率的亲民政府体系的民主。于是，民主内容中对最高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常被忽略，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发展潜力亦无法保证。对民主的务实态度影响着我们的发展模式，限制了我们尝试在改革的环境下建设民主中国新举措的推出。

在笔者看来，时下的中国正在跃进式地过渡到一个更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社会利益的多元和复杂使得中国政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发生了积极性的变化，尤其是在精英政治、机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呈现出制度多元化、公共空间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活跃的历史大趋势。中国美国学的发展，首要之任务便是加大对美国民主的研究，总结美国民主发展特别是其民主的国内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讳言其成功，不夸大其失误，排除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建立一套衡量中国民主发展指标和评估中国民主程度的标准，这是中国民主转型战略和策略制

定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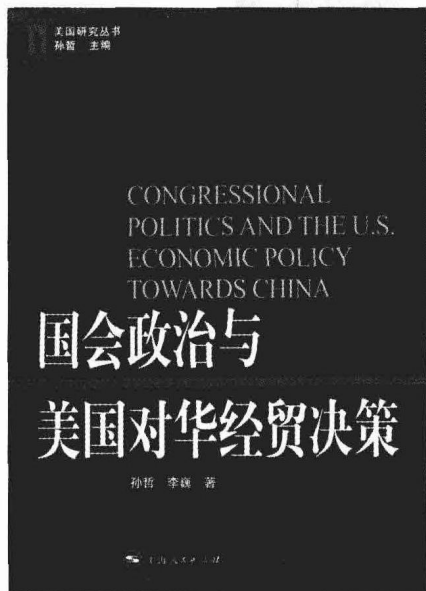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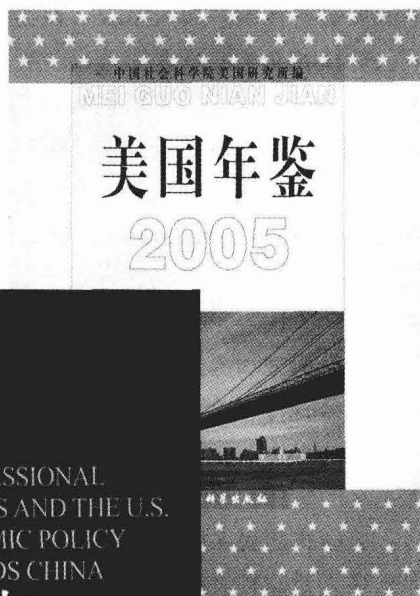
挑战之二，是如何对美国现行共和政体的巩固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问题。

美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内战结束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政治稳定，而在稳定过程中，美国的综合实力又得到震惊世界的提升。美国的稳定安邦之道何在？其跃进发展之术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思考的重点，不单是总结美国崛起的动力，更为重要的，还应该了解美国处理转变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的秘密。

美国现行政治体制至少存在两大弊病：一是其民主理念和制度性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如何“让民主运转起来”并提高政府效率，不少人为之困扰。二是我们经常批判的金钱政治的影响。美国在这方面虽然也作出许多努力，但其始终是美国政治的“阿基里斯之踵”。这两大弊病使不少政治学家不断呼吁美国要以草根民主特别是社区文明建设来改善美国民主的最底层生态；同时，他们也主张对普通百姓参与政治进行鼓励，对百姓维权意识要进行重点培育。这被看成是美国民主大众化、普及化的最佳途径和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创新的良方妙药。

变化中的美国不是没有问题，各种问题之多，有时也超出我们中国人的想象。例如，美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为族裔矛盾、种族摩擦、社会差距、贫富分化、失业上升、生态问题、矿业安全等重大问题所困扰；而近年来的恐怖主义、宗教分化、医疗保健、移民改革等难题，又使美国政府举步维艰，进退两难。例如，时下美国在倾其全国之力重点反恐之外，也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政府协调来集中处理以下八个领域的社会矛盾：（1）经济调控问题，如政府对金融市场、房贷危机、企业革新的鼓励和调节；（2）生态及环保问题，尤其是核污染、阿拉斯加冰川、气温升高、空气污染等引发的种种效应；（3）教育投入、公共教育质量、反教育歧视、防范校园暴力等问题；（4）医疗保健计划及退休保障问题；（5）同性恋婚姻、堕胎问题、种族问题；（6）行政伦理问题，集中反映在游说丑闻及官员腐败问题上；（7）枪支管理及反社区暴力等问题；（8）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互联网传播规则等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



[1]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224.

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矛盾,这和美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极为类似。对美国治理社会问题背后的政治考虑和政治安排加以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可以直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的立法倾向、立法内容和立法技巧,了解美国联邦和地方各级行政当局的施政方针。

进一步说,对美国内政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可以打开一扇美国学研究的新窗口,对于深入剖析美国国内长期稳定的宪政基础,探讨美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样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挑战之三,是如何正确判断美国外交的走向,深入理解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逻辑问题。

大国的兴衰写就了激动人心的人类历史,但是世界整体发展趋势却永远让人困惑。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是一个日渐式微、走向崩溃的大国,还是一个自罗马鼎盛时期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美国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以来,其在全球经济实力及军事力量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在今后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情况可能依然如此。如果继续“领跑”世界,美国会如何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世界又将如何对之做出反应?

后“9·11”时代,美国外交政策掀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使美国开始相信“不受别国约束的美国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1],美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今天我们也许看到了美国国内对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反思,但更应该看到这种反思并未否定反恐时代美国外交的基调。美国作为一个“全能选手”,仍想承担“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义务”;美国国内主流外交决策者依然认同这样的假设:即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日益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正在准备以非常规手段发动攻击的世界里,美国必须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不仅要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还要防范潜在的威胁。

应当说,美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它最有可能成为任何敌视西方的国家和集团的目标。美国外交行动的逻辑短期内也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仍有可能摆脱朋友、联盟和国际组织强加给它的种种限制,从而采取果断的行动来“保护自

己”,运用自己的实力“走出国门去寻找恶人以便铲除”,最终改变自己界定的世界危险状况。

笔者断定,今后的美国仍将不改其本性,企望通过一种“替天行道”的方式来向世界传播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基督教教义,试图最大限度地对外移植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鼓励其他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会极力灌输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针对这种现实,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把握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关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也必须准确分析世界反美主义的实质和可能性的转变,在美国权力和影响力消长的长周期里,保护中国国家崛起的根本利益,同时处理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美国的美国学研究最独特的研究特点就是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集众家之长,摒弃门户之见,以兼容并蓄、多元组合的方式推动学科的发展。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专业和其他地区研究专业一样,大多通过发掘本校各相关学科的师资力量,鼓励学生跨学科修课,参与富有特色的美国研究项目。

我国情况不同,类似的地区或国别研究机构运作情况与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仅从笔者相对熟悉的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研究情况来看,中国美国学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决定研究美国的中国视角,完全可以就我国的国家利益所关注的独特选题来进行创新。

笔者就今后中国对美国政治与外交方面的研究,提出一些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来与诸位学术同仁共勉。

第一,整体梳理美国学者对美国文明的自我探索脉络,了解美国研究学科发展和方法论更新方面的总体情况。

美国的美国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美国政治研究为例,在美国大学体系里,“美国政治”属于政治学研究四大领域之一(其他三个分支为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还要高于其他三个分支学科。美国的“美国政治”研究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大多数美国政治专业虽然也鼓励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做比较性的研究,但是从过去50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学有所成就的美国学者还是集中在研究美

[1]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2003.

国自己的国家情况，他们对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研究对象的狭隘性恰恰就是它在美国生存并发展的合理性和独特性，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太特殊了，几乎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美国学者感到很难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做深入的比较。

二是美国政治研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同样经历了美国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革命。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争论还在进行之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学者开始研究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法律制度和传统准则，但到了1960年代，他们便受到美国社会科学界掀起的“行为主义革命”浪潮的巨大冲击。两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家达尔和阿尔蒙德教授对此都有所总结。¹ 行为主义作为政治学的新方法与范式，非常关注政治活动者的行为，对传统的机构研究法不以为然。它主张“价值祛除”（value-free）或“价值中立”（value-neutral），强调方法的科学性，鼓励政治学要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资料来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政治学领域出现了几部至今还被看作是经典的学术作品，如杜鲁门的《政府过程：政治利益和公共舆论》、坎贝尔的《美国选民》及达尔的《谁在统治：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等等。² 虽然如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出现后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政治的形式，对政治的实质揭示得不够；过分注重方法论，忽视实际问题的研究；过分注重微观分析，忽视宏观理论的建树；过分推崇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而排斥历史的哲学的方法；试图排除价值成分，只解释“是什么”，不研究“应如何”，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随着亚非拉独立运动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内政外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事实证明，行为主义政治学未能担当起科学说明并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

重任。此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逐渐低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兴起。

不论是采用哪一种范式，美国政治研究离不开对事实和价值的分析及判断。这一点其实早在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发表《论美国民主》时便已得到证明。³ 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些优秀著作不仅追溯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传统，反思不同范式的优劣，还特别关注美国政治发展中的机构革新问题，深入研究涉及美国独特政治形态的专题，⁴ 如美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强大的国家政府，为什么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团体一直受到制衡，为什么美国的福利政策相对欧洲来说一直不够宽容和大方，为什么美国价值观一直处于一种冲突与融合的状态，等等。⁵

客观地说，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为探索美国自身文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研究范围涵盖美国的政治传统、机构革新及观念的变革等方方面面，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个努力，便是要了解美国同行的研究动态，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目前中国学界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工作，但是美国研究方面的相关工作却刚刚开始。美国学者的努力是美国研究这个学科的根基所在，不管将来我们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是否能够借鉴，我们都应该开始这项工程。学术前途之艰巨，不能不让人产生“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第二，深入了解美国国家决策机制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对总统权力的扩张和国会在国家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宪政各层次之间的互动，包括联邦与地方的分权制衡、政党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作用、美国政治改革举措与政治革新措施等重大课题进行更为细致地分析。

例如，在对美国总统及总统制的研究中，我们很少看到白宫内部的活动情况。白宫办公厅是如何处理

[1] Robert 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 763-772; Gabriel Almond. Political Science: A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 Goodin,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96.

[2] David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1;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Donald E. Stokes,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0.

[4] Michael Zuckert.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 Thomas West. *Vindicating the Founders: Race, Sex, Class and Justice 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Jeffrey Friedman.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ger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Americ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国内和国际危机的？它怎样协调下属各部级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反恐形势的需要进行了情报机构方面的变革，布什总统在2004年12月17日签署《2004年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美国还成立了统管整个情报界的国家情报局，开始了情报系统自1947年中情局创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会对美国内政外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加强对美国国家情报体制改革的研究，从其理论意义来看，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国家情报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未来走向，增进对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深入了解；从现实意义来看，对于中国情报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壮大，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挑战，日益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情报体系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美国情报界的改革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学习和借鉴改革中的有益之处，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美国情报活动的警惕与防范，保护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三，改变对美国政治地理变化特别是美国50个州具体研究资料匮乏的现状。

美国立国之初采用邦联体制，地方自治传统使得州权与联邦权力之间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垂直制衡。近30年来，美国的人口和经济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后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反过来对美国政治版图影响深远。例如，从美国政治地理变化在国会的表现来看，美国国会作为一个代议机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按照地区划分的选区选举代表组成国会的地区代表机制，主要表现为按照州选举参议员、按照登记选民的数量选举国会众议员的代表机制；二是以利益集团游说为主要形式的功能代表机制，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雇佣说客开展游说和公关，以影响国会议员决策的行为。在实践中，地区代表机制和功能代表机制是叠合在一起的，并且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对外经贸交流的增加，功能代表机制越来越重要。对美国政治地理发生的变化特别是50个州的具体情况加以详细地分析，应该是深化中国美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近年来，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一些农业州、中西部地区被接受并持续扩展。研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变化将使我们及时了解美国的思想动态及政治

发展，而考察美国政治地理结构并将代表地方利益的议员进行归类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国地方政治的行为规律并预测其政治走向。

第四，对目前引起美国国内争论的难点问题及专题研究做更透彻地分析。

美国两党在教育改革、医疗保健、移民政策、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到底在争论些什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今后这些难点问题会对美国政治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解答。

以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努力为例，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游说极为普遍、竞选资金需求极大的政治体系中，腐败的流行是一种必然。但是，目前全美每年因贪污而受到联邦政府指控的公职人员在1100人左右。从1983年至今的20多年间，官员腐败的数字基本上呈现一条平稳曲线，差别只在几十人之间，在全球而言这仍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美国政治为什么相对清廉？这主要得益于其多年来不断制定出新的制止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并设立起监督和执行这些法律和制度的机构。美国是以立法形式来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较早的西方国家之一。早在1883年，美国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得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和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贪污对策法》。这是一部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重要法律，该法把选举中的间接贪污行为作为重点惩处的内容，规定总统和国会议员得到100美元以上的捐款必须登记，参议员竞选费用的最高限额为2.5万美元。美国于1970年实施《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这部法律加大了对贪污受贿官员的处罚力度。此外，还赋予了执法机关调查腐败犯罪的特权，即一旦经法院授权，在根据该法所规定的案件调查中可以使用联邦执法机关所使用的窃听和电子监控手段。“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又从国家层面大规模地进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设，集中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规，包括《联邦选举竞选法》《监察长法》《独立检察官法》《政府道德改革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和《信息自由法》等。研究美国的反腐体系以及反腐行为，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美国政府的实际运作和其官员行为所受到的限制。

第五，开发对美国政治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探索美国财富与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 考察美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我们不难看出，美国财富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侵蚀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财富与民主之间形成了奇妙的悖论。例如，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创造财富的速度和数量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的带动又一次实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以及人均财富拥有量均独占世界鳌头。然而，后来经过美国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小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却代表着美国极少数大公司、大财阀、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小布什“公司政府”的组成不光是美国历史上富豪色彩最浓厚的一届政府，而且在政策制定方面也在许多领域成为“财富的代言人”。“公司政府”影响、控制乃至垄断国家政权并使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严重损害和侵蚀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再如，目前很少有人探讨美国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研究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美国跨国公司如何就民主输出和人权政策问题在国内与美国政府、公共利益集团、基金会、媒体、公众舆论互动？美国国内公众对发展中国家人权、民主问题的关注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选择？这些问题都可以展示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输出关系的国内基础。同样，美国跨国公司又可以通过对政府民主项目实施的参与以及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人权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政治后果可被视为是美国外交的间接成果。对这些问题，中国学者决不能视而不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西方化’和‘美国化’正在每日每时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在都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及产品；在电脑上，我们所通用的工作平台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中文视窗，最通用的文字处理器是美国微软的中文WORD，其他重要的软件也大多来自美国。”所有这些表面性现象的背后

是“美国的价值也成为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中国人追求的价值，从而使这些中国人的心灵开始‘美国化’。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2]。

第六，加强对美国的选举改革与政治营销问题的研究。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政治制度的纽带、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多元利益的调节器。美国的选举作为重要的大众参与形式和民主参政的机会已经引起了我国民众相当大的关注，其运作方式也逐渐为我们所熟悉。例如，我们都知道“没有自由的选举，就没有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定律，这其实说明了治国的关键在于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的政权必将崩溃，这就是“民犹水也，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既然是要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与支持，不靠军队和警察武力强制和压迫，那么使民信服、全民归心的最好办法便是让人民推选自己信赖的政府。普通人民正是通过这样的选举活动，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的伟大目标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选举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选举管理乏力，改革势在必行。

所谓的“市场化”，是指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美国竞选手段日益现代化，更加接近市场运作，选举领域也开始逐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竞选专家。现在，美国重要选举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竞选公关顾问和政治公关公司的影子，重要候选人背后总能发现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选举策划人、民意测验专家、媒体顾问、演讲写作人、广告制作人、游说辩士、助选名嘴。他们横跨调研、形象包装、文宣策划、政策分析等多种领域，既懂政治又了解新闻媒体的需求，常常照顾性地透露一些选举内幕，以讲故事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政治主见，深得媒体的偏爱。当然，过度的“市场化”也使美国候选人开始过分依赖包装，象一团粘土，任由竞选专家摆布。备受争议的“选举软钱”的介入又使得美国国内要求建立公平、纯净、简约选风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果我们在看美国选举中的种种新闻和介绍时，能在喧闹中冷静思索一些可以借鉴的政治技术和政治

[1]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2] 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8。

经验,恐怕对我国未来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会有所启迪。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大,我们已经习惯了国内市场上商品竞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电视广告、商品展示和新闻发布会、产品推广的路演等等。我国普通百姓对这些行销形式已从好奇、尝试着参与过渡到了习以为常,这已经为中国未来必定会普及的各类竞选做好了政治行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准备。

但是,一旦真的开始把西方的一些选举手段运用到实践当中,我们又不得不预防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民主激情”的弊病,做好充分的选举管理和选举改革准备。

第七,把握美国大众媒体与公共参与如何影响政治及外交走向。

1831年,托克维尔前往美国,在这片新大陆上考察了9个月。他返回法国后,在《论美国民主》中就已经使用了“不可抗拒”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美国报纸的政治影响力。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大众传媒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报纸、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形态改变了美国政治沟通的方式和大众参与的渠道。

美国是一个商业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传媒行业作为一项规模庞大的产业,其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信息和娱乐。但是,美国新闻界乃至美国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客观公正、对社会负责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专业主义理想和职业准则,媒体应当做监督政府的“牛虻”。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承认,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美国政府更加开放,也对美国民主的不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现在有上千名媒体人拥有白宫记者通行证。¹美国新闻界对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及伊拉克战争的揭露,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国内、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而美国国会通过的《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案》也使得绝大部分的政府文件都可以向公众开放,大众传媒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力度大大增加了。

美国大众媒体改变了公共参与的方式,也同时影响着美国政治及外交走向。对“第四权”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客观、综合的阐释,是中国美国学纵深发展的另一个突破口。



**VOTING
IS PATRIOTIC**

第八,积极研究美国目前倡导的转型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目标、战略及手段。

冷战的结束在全球范围内打开了民主化的闸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更是明确提出美国外交的新战略,其核心部分便是强调转型外交和公共外交。转型外交最重要的含义在于美国希望能通过非军事的各种外交手段推广其所界定的民主,从而促成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转型外交的试验是从中亚的多种“颜色革命”开始的,现在正在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美国认定的“非民主”或“欠民主”国家。公众外交也叫做文化外交,一般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念、目标、利益和政策并同时了解对方的活动。²美国的公众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的,核心是信息和文化活动的跨国交流,如运用新闻媒体、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等传媒手段来宣传美国的政策,利用教育文化交流特别是学术交流和公民之间的交流来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输出美国的民主观念。³

美国想改变中国、“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是不变的。从根本上,它也不喜欢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充满误解、敌意和理想化的改造规划。所以,仅从

[1] (美)海瑞克·史密斯. 权力游戏. 刘丹曦等,译.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24.

[2] Kenneth W. Thompson, ed. Rhetoric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Stanton Report Revisited. Lanham, 1987: 97. 转引于韩召颖. 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30.

[3] Ibid., 192-224.

外交层面、不从战略高度看问题，就不了解融在美国人血液中的那一套对国家根本利益坚定支持的东西。但是，民主不是美国的知识产品，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代的主流世界是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正是当今世界发展浩浩荡荡的大潮，代表人类进步的大方向，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观念，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为成熟的、更为世人广泛认同的民主中国。

国内外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一直存在“三解现象”，即对中国特色民主的“不了解”“误解”和“曲解”。¹ 中国只有赞同全球的民主进程并启动自身的民主进程，才可能加入主流世界。这是大势所趋，“世情”和国情所致。作为一个开放了的文明大国和一个“后发型”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借鉴早发型民主国家的“他山之石”，以更加积极的正面姿态，通过自身的民主建设，不断推动全球民主事业的发展。站在这个高度看美国的转型外交和公共外交，我们大可不必刻意保持戒备心理，而应提出自己的外交民主转型战略，同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内民主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为国内建设创造更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还要为国内建设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

上述八个问题的提出，其意义更在于向我们提供一种如何将中国美国学研究深化的思路。要拓展美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我们需要加深理解美国大战略的走向，需要考察美国反恐与应对传统威胁的力量使用，需要反思美国与欧洲之间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需要明晰美国宗教右翼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需要判断中国崛起在美国引发的种种辩论背后的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格局，等等。

笔者再次呼吁，美国学研究如此重要，从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来看，它应当是当今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最需要并最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印度、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等都将美国作为自己国家发展的参照系，因此而加大了对美国研究的投入力度。为了能够在新的世纪更好地处理好对美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营造良好

的国际环境，为了能为我们自身的科学发展提供科学的镜鉴，加强我国对美国的研究和全面构建中国的美国学学科便越来越成为时不我待的重要战略任务。

美国学研究是当今国际问题研究中最需要并值得投入的研究领域。中国美国学是诞生、成长于中国的学问，创建中国的美国学理论体系也是加强对美外交的重要途径。加强中国的美国学研究首先是新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会对世界事务产生深远的影响，深入分析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是处理好中美关系、把握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发展”的关键因素的迫切需要。

孙哲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暨国际关系博士。目前担任国务院台办特聘研究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咨询专家、外交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及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1] 唐俊. 解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坚持 完善 发展——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林. 法制日报，2005-10-24(1).